

试论社会有序性的需求是夏国家建立的根本原因

徐昭峰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摘要：关于夏国家建立的原因，一直是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致力于探寻的重要课题。学者们多从史前的战争和洪水在夏国家建立方面的作用进行探讨，或者将西方国家的产生模式与夏国家产生模式进行对比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夏国家建立的内在动力问题进行了尝试性探讨，提出社会有序性的需求是夏国家建立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社会有序性 夏国家 建立 原动力

中图分类号：K8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10)04-0039-06

夏国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或者说在原始社会末期，以夏部族为代表的中原龙山文化为何能在激烈竞争的局面中脱颖而出建立国家？这一事件的最根本的内在动力是什么？这是学术界一直以来讨论的热点问题。

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中国文明形成的机制是内动力而不是外动力。而与之有关的观点主要是战争与洪水这两个主要因素。本文也认为

中国文明形成的机制是内动力而不是外动力，但为什么本是邦国林立的多元多中心格局而最终结果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脱胎于以夏部族为代表的中原龙山文化？这正是我们所要探讨的重点。本文认为，夏国家的建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有历史的、政治的、环境的等诸方面的因素，战争和洪水是其催化剂，但真正的深层次的原因是社会有序性的需求。

《考古》1979年第1期。

[5] 张宏彦：《渭水流域老官台文化分期与类型研究》，《考古学报》2007年第2期。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队：《甘肃天水师赵村史前文化遗址发掘》，《考古》1990年第7期。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队：《甘肃天水市西山坪早期新石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5期。

[8] 甘肃省博物馆等：《甘肃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文物》1981年第4期。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队：《一九七七年宝鸡北首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2期。

[10] 西安半坡博物馆等：《渭南北刘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调查与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

[11] 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临潼白家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文史研究》1983年第2期。

[12] 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王世和、张宏彦：《1982年商县紫荆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博》1987年第3期。

[13][14] 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仰韶文化早期聚落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6期。

[15] 石黑立人：《全国环壕集落地名表》，季刊《考古学》第31号，雄山阁山版，1990年5月。

[16][17] 钱耀鹏：《关于半坡遗址的环壕与哨所——半坡聚落形态考察之一》，《考古》1998年第2期。

[18] 张治强：《姜寨遗址半坡文化墓葬分期试析》，《考古》1999年第12期。

[19][20] 郎树德：《甘肃秦安县大地湾遗址聚落形态及其演变》，《考古》2003年第6期。

[21] 严文明：《史前聚落考古的重要成果》，《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

[22] 刘恒武：《良诸文化的聚落级差及城市萌芽》，《东南文化》2007年第3期。

一、史前战争和洪水在夏国家建立过程中的作用

在人类迈向文明门槛的前夜,也就是龙山文化末期,首先是中原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最早走向文明,建立国家。我们知道,中原地区正处于我国版图的中心,正所谓天下之中。一方面河网密布,环境适宜,气候适中,不仅极宜适合人类居住,而且从新时期时代早期这一区域农业就极为发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一地域为四方会聚之地,也是诸族落邦国冲撞最激烈之地,这使得中原地区最容易吸收四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的因素^[1],而这毫无疑问加速了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此不赘言。

其次,主要发生于中原及其临近地区的冲突与战争对推动夏国家的建立方面的作用是无可置疑的。

从国内外考古发现结合传说资料及文献资料并证之以民族学证据,史前战争是客观存在的。

考古发现可以从三个方面提供史前战争存在的证据。其一,是作为战争物化形式存在的大量防御设施如环壕和城垣等。特别是城垣,当起源于聚落环壕的修建。在距今8000年的时候,长江流域的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则第一次出现了在围壕内侧以围壕中的取土垒筑低矮围墙的现象,其后城垣愈修愈高,愈修面积愈大。修筑城垣的目的最初可能只在于防洪,随着冲突与战争的日益频繁,城垣的主要用途发生了改变,以防洪为主、防御为辅变为以防御为主兼居防洪的作用,愈进入文明社会城垣的这种特质表现得愈加明显,如历史时期的许多重大战役均是以城市攻防战的形式展现。以考古发现证之,中原地区在仰韶文化时期仅发现有一座城址——郑州西山城址。关于该城址的功用,有学者就指出:郑州西山城址座落于北高南低的邙山岭上,如果说其南城垣的功能可用于防水患(如南墙贴近枯河),它的北墙在高高的邙山岭上,远离河道,不会是防水的设施,这座面积不大、出土遗物规格不高的城址,显然是用于防御敌人的城堡^[2]。进入龙山文化时期后中原地区城址的数量有较大增长,如出现了辉县孟庄、安阳后冈、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郾城郝家台、淮阳平粮台等一系列城

址。这些城址可能具有防洪的作用,但其最为重要的作用则是用以防御敌人的进攻的,这些城址的突然大量出现正是此一时期冲突与战争日益频繁和激烈的反映。其二,是作为史前战争物证的武器的发现。史前能够确认的武器有弓矢(主要表现为石镞、骨镞及蚌镞的大量发现)、石球(流星索)、石矛、石戈^[3]等,如在内蒙古清水河县岔河口仰韶文化环壕聚落的东寨门内侧,就发现有许多堆放在一起的石球,可能是扼守寨门的远射(弹丸)或投掷武器^[4]。还有学者指出石斧也应是史前武器的一种^[5]。本文认为,石镞、石铤、较大型的穿孔石刀等也应被认定为武器。弓矢、石球、石矛、石戈、石镞等作为武器,既可用以日常狩猎,也可作为战时武器当无须赘言。作为日常生产工具的石斧、石铤、较大型的穿孔石刀等,由于其自身厚重锐利,具有较强的攻击性和杀伤力,作为战时武器使用既合情也合理。其三,是史前墓葬的非正常死亡证实冲突与战争是客观存在的。河北邯郸涧沟遗址的2座龙山时期房址中各发现3具人头骨,每具人头骨上都有若干长条状斧砍痕迹,并被剥去了头皮^[6]。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一些新石器时代墓葬的人骨上发现有数量甚多的石镞,其中M3墓主缺少左上肢骨,胸、腹部发现12枚石镞,右颞骨和尾椎骨各射入一枚石镞^[7]。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发现的34座新石器时代墓葬中,有10座为无头一次葬,6座二次葬缺少头骨^[8],无头墓比例之高,当是史前战争和猎头习俗的重要例证。山西陶寺遗址,在已经废弃的宫城内,IT5026揭露的陶寺晚期灰沟HG8里还出土了三层人头骨总计30余个,散乱人骨个体近40~50人。头骨为多,分布杂乱,多数有砍切痕迹,其中人工劈下的面具式面颅有4个以上。从头骨和肢体各部位的杂乱分布看,人体明显被肢解的。经现场鉴定,多属于青壮年男性的骨骼^[9]。陶寺M24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主第10节胸椎处镶嵌一段石镞的锋尖,石镞的尾端见于墓主左肋部,发掘者认为墓主显然死于箭伤^[10]。以上异常现象毫无疑问是冲突和战争的真实反映。这种类似的现象在其它诸多遗址中也常有零星发现。

传说和文献资料证实史前战争是存在的。这

样的战争早在黄帝时期即时有发生,至夏王朝建立前夕的大禹之时传说与记载更多更详。《史记·五帝本纪》云:“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又“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淮南子·天文训》“共工与颛顼争为帝”;《国语·周语》下韦昭注云:共工“与高辛氏争而王”;《吕氏春秋·召类》言“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吕氏春秋·荡兵》:“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难矣,五帝固相与争矣。”大禹时期的对外战争主要是三苗及共工,《墨子·非攻下》说:“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竹书纪年》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来朝。”《尚书·大禹谟》、《吕氏春秋·召类》《战国策·魏策》中记载有大禹征有苗事。关于大禹与共工的战争记载,《荀子·议兵篇》说:“禹伐共工。”《荀子·成相篇》说:“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禹攻共工国山。”《史记·五帝本纪》有“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的记载。此外,大禹的对外战争还涉及周临地域,如《墨子·尚贤》云,大禹“东教乎九夷”;《吕氏春秋·召类》言大禹“攻曹、魏、屈骛、有扈、以行其教”。这些传说及文献资料虽尚不足于反映其时战争的残酷与激烈,但足以窥得其时战争存在的客观事实。这些战争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展开,涉及当时较大的几个部落及部落联盟,以至最后主要是大禹所属的夏后氏部族的对外征伐,这离中原地区的先民迈进文明的门槛已经不远了。

史前战争对推动夏国家建立方面的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通过战争使得王权渐次产生并最终形成。与此有关,战争形成了以王权为中心的一个新的金字塔般的统治关系和统治秩序(包括组织形式和分工等);战争促使国家机器——军队建立的制度化;战争促使了法律的萌芽,并最终以条文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些都为国家的确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第三,史前特别是大禹时期的大洪水及由此开始的由大禹主导的治理洪水的系统工程客观上

促使并加速了夏部族由部族向国家的转化。

从传说和文献资料结合环境及考古资料,史前的大洪水是存在的。这场大洪水从尧时开始,延至大禹之时。其一,有传说及文献资料为证。《尚书·尧典》载:“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孟子·滕文公上》言“尧之时,天下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孟子·滕文公下》言“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上者为巢,下者为营窟。”《吴越春秋·吴太伯传》云:“尧遭洪水,人民泛滥,遂高而居。”有学者认为遂疑为逐^[11],此言是对的。至大禹之时,洪水更盛。《墨子·七患》引《夏书》云:“禹七年水”,《荀子·富国》说“禹十年水”,《庄子·秋水》言:“禹之时,十年九潦。”为了应对大洪水对时人的危害,帝尧之时便任用鲧开始了对洪水的治理。但鲧治理水患方法不当,“九年而水不息”,于是帝舜“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后,任用大禹治水。大禹治水有方,采用疏导的方法彻底治理了这场持续日久的水患。关于大禹治水之事,许多先秦古籍如《诗经》、《尚书》、《墨子》、《论语》、《孟子》、《国语》、《左传》、《楚辞》、《山海经》、《荀子》、《韩非子》、《管子》、《庄子》、《吕氏春秋》等均有记载。其二,以地质及环境资料证之。对不同气候指标高分辨率的全新世气候记录分析表明,我国在4200a.B.P.~4000a.B.P.气候发生了突变,这一气候巨变具有全球性,而正是这种气候突变可能导致史前异常洪水的发生^[12]。从地质资料看,远古时期,黄河在其下游流经的广阔地区曾多次改道,形成了多道贝壳堤。据测定,距今6500~4600年黄河从河北平原入海……距今4600~4000年……(黄河)改道从苏北平原入海……距今4000年前后,则又改道从河北平原入海^[13]。这说明史前大洪水是客观存在的,否则,黄河也不会屡屡改道。第三,以考古发现证之。目前洪水迹象在考古学上最直接的例证是河南辉县孟庄龙山城址的发掘,发掘者认为“最能表明孟庄龙山城址毁于洪水的证据是西墙的中段,该墙中北部有一大的缺口,已探出部分15米宽,

从已发掘的 T128 看,原有的龙山城墙夯土已全部被洪水冲掉,且洪水在该探方内下切入生土达 1.5 米左右,由西向东伸去。冲沟内的淤土中包含有龙山文化各个时期的陶片”^[14]。中原地区同时期已发掘遗址中有明显遭受洪水袭击现象的还有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密古城寨、新密新砦、山西陶寺龙山城址,黄河上游有青海民和喇家遗址^[15]。种种证据指向史前大洪水的发生是一种历史事实,而非传说。对于史前的这场洪水,考古学界多认为确有其事。

这场洪水对夏王朝建立的作用,学界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俞伟超先生曾说:“4000 多年以前我国曾发生一次延续了若干年的特大洪水灾害,应该是历史事实。当洪水泛滥时,大河、大江流域所遭灾难必以下游为重。可以估计到,在那个时期,黄河、长江的下游,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之地,当是一片汪洋,人们只能向高处躲避或是逃奔外地,原有的发达的龙山、良渚文化的种种设施,顷刻便被摧毁,而其农耕之地更是常年淹没,再也无法以农为主了。对大河、大江的中、上游流域来说,所受灾害当然要小于下游。于是,黄河中游的河南龙山文化仍正常地向前发展,从而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出现了夏王朝。如果 4000 多年前不发生这次大洪水,我国最初的王朝也许而且应该是由东夷建立的”^[16]。王巍先生也有大致相同的分析^[17]。童恩正先生也认为:“从大量的历史记载来看,中国的第一王朝——夏王朝的建立,确实与水利有密切的关系……从史实看来,中国国家权力的形成,极可能与防御和集体的水利事业有关,亦即与控制集体劳动的人力有关,而与土地所有制没有直接的关系”^[18]。缪雅娟认为,原始社会末期的滔滔洪水,不仅为夏部族的崛起提供了契机,而且为夏王朝的建立铺平了前进的道路。夏部族因洪水而首先崛起,又因治理洪水加之战争等手段完成了由部族向国家的转化。以治水为契机,又通过治理洪水及战争等方式建立和完善国家机器,这就是中国文明形成的直接原因或动力,也就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主要特点或模式^[19]。

总起来看,史前洪水在推动我国国家建立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其一,这场洪水直接毁灭

了原本高于或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发展水平相近的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原本多元多中心的发展格局变为多元一中心。其二,由中原地区先民主导的治水工程不仅使得中原地区的文化持续发展,而且在组织、协调治水过程中,由于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重要劳动力均归大禹为首的集团统一调配使用,便使得该区域内原本较分散的氏族部落迅速产生了向心力、凝聚力,最终确定了大禹所属的夏后氏部落的核心地位和领导地位,并由此实现了部族向国家的蜕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古埃及国家的产生与尼罗河洪水的治理有关;而美索不达米亚早期国家机构组织的出现,也是与引水、用水的需要和斗争有关^[20]。其三,治水使得原本通过社会分化和战争而形成的金字塔般的统治关系和统治秩序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史记·夏本纪》云,(禹)“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这段话即反映了参加治水人员的层次,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统治秩序是大禹治水之前已经存在的,治水工程仅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秩序。高高在上的是禹,所有参加治水的人都需听命于他;诸侯是次一级,他们是邦国首领或部落首领;百姓又次一级,应是社会分化形成的新阶层——贵族或者说奴隶主;人徒是最低一级,包括社会分化形成的贫穷的氏族成员——自由民和奴隶,他们是治水的主力军。

二、社会有序性的需求是夏国家建立的原动力

李伯谦先生也曾对以夏部族为代表的中原龙山文化为何能在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竞争激烈的几个文化中脱颖而出,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进行了总结,主要有三方面因素:其一,中原龙山文化处于当时几支大的铜石并用文化中心,客观上有利于吸收周围及邻近同期文化的先进因素;其二,中原龙山文化居中的地理位置,在当时部落冲突与联合的复杂斗争中必然占有主导地位,一方面自己向外扩张,一方面又成为周围及邻近部落集团争夺的主要对象,这种连绵不断的冲突与战争,势必促进占有主导地位的中原龙山文化及二里头文化居民部族中国家机器的较早出现与完善;其三,治理洪水是一项系统工

程,既需要周密的组织工作,又需要有绝对权威的指挥,这客观上无疑会较其它地区以更快的速度促进国家机器管理公众事务职能的产生^[21]。这种分析正与本文分析略同。

本文在开篇之初即已指出,夏王朝的建立有历史的、政治的、环境的等诸方面的因素,战争和洪水是其催化剂,但真正的深层次的原因是社会有序性的需求。

恩格斯曾指出:“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22]。正所谓一语中的。

在人类迈向文明门槛的前夕,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这一区域为了争夺人口、资源及土地等,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虽然战争促进了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但这种交流与融合需要付出对生产进行极大破坏为代价,这并不符合当时最广大的部落成员的根本利益,也不符合广大的中小型部落的根本利益,部落内部及部落之间有维持现有秩序、合理分配土地及资源的强烈意愿。史前的大洪水造成了人类生存的危机,如果不进行资源、人力的整合来共同面对这场危机,整个人类社会就可能会被消灭。正是上述两种当时社会主要的矛盾与冲突,促成了建立社会有序性的强烈意愿——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国家的产生。这是其根本原因,正所谓人心所趋,大势所向。

另一方面,由社会分化形成的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而出现的新阶层、在部落冲突与战争中由于军功而封赏及各种原因新形成的阶层——贵族的出现,他们有维护其既得利益及地位的强烈愿望。部落酋长或邦国首领是其小集团利益的代表,他有维护其集团、集团内部以他为首的贵族的根本利益的义务及强烈愿望。作为治水工程的

核心集团的代表——大禹,他既有维护其固有集团——夏后氏部落处于利益核心即既有的处于整个大的部落集团的最上层的核心地位和统治地位,同时又有维护各既得利益集团的基本权力和利益以及其自身的切身利益——高高在上、独一无二的绝对统治权。以大禹为首的统治集团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即代表最广大氏族成员的根本利益——建立社会有序性的强力工具,最终推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暴力手段来维持现有秩序的工具——国家的出现。

但国家不可能以和平的方式出现。《述异记》卷上说:“昔禹会涂山,执玉帛者万国。防风氏后至,禹诛之。”《史记·孔子世家》仲尼曰:“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这一记载说明大禹已拥有了对诸侯生杀予夺的大权,大禹至高无上的王权地位已牢牢确立并得到了完全认同。但进入国家门槛——建立社会有序性还需要最后一道程序——王位世袭制的确立。在此之前的所谓禅让制,学界多认为不是历史的真实。在史前为争夺人口、土地、资源,为生存拼死而战的部落绝对会依托本部落的实力极力争夺部落联盟的最高统率权,从而最大限度的维护本部落的利益。故《竹书纪年》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韩非子·难三篇》曰:“舜逼尧,禹逼舜,汤伐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而天下誉之。”张学海先生曾指出,尧是否真的为舜所囚所杀,我们不清楚。但尧晚年和舜互相攻伐,双方的争斗以舜胜告终,舜、禹、汤、武王之成为“帝”或“王”,靠的是本人的才能与本国、本族的实力,其中免不了诉诸干戈,则是事实,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23]。而要结束这种为争夺部落联盟最高权力而进行的无休止的战争,就必须将王位的承袭以一定的形式固定下来。从尧开始,经历舜,到禹时期最终固定下来,这就是王位世袭制。《史记·五帝本纪》载尧即有授子丹朱以王位的想法,“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只是子丹朱的才能及威望不足于服众,而舜的才能、威望及其所代表的集团的实力足够强大才不得不罢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史记·五帝本纪》)然后舜在诸部

落的拥戴下终战胜丹朱而践天子位。王位世袭制的首战以失败而告终。“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史记·五帝本纪》）王位世袭制的第二次尝试也以失败而告终。至大禹之时，“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位，是为夏后帝启”（《史记·夏本纪》）。王位世袭制的第三次尝试最终取得了胜利，并开我国后世历代王朝王位继承制之先河，成为一种延续近四千年的制度而确立下来。这种制度的确立既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又与大禹及其夏后氏部落和禹子启的经营等诸因素有关。大禹的经营自不待言，其子启的继位完全是通过战争来完成的。《竹书纪年》云：“益干启位，启杀之。”其后，有扈氏不服，《尚书·甘誓》载夏启讨伐有扈氏，说“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史记·夏本纪》言，启乃召集六军进行征伐，“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服”。自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国家——夏国家在中原大地上终于建立起来了。夏国家的建立，结束了史前千余年部落之间为争夺人口、土地、资源及部落联盟最高统治权而互相攻伐的历史，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维护既有利益、合理分配人口、土地、资源以一种有序的状态下进行，不再进行无休无止的内部消耗而导致灭亡。

附记：本文得到辽宁师范大学辽海历史与旅游文化研究中心项目资助。

注释：

[1] 王震中：《邦国王国与帝国：先秦国家形态的演进》，《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2] 赵春青：《长江中游与黄河中游史前城址的比较》，《江汉考古》2004年第3期。

[3] 在河南新安县高平寨遗址中发现一件石质的戈形器，参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新安高平寨遗址试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8期。

[4] 王大方等：《清水河出土新石器时代巨型鱼龙夯土雕

像及大批文物》，《中国文物报》1998年8月19日1版。

[5] 钱耀鹏：《史前武器及其军事学意义考察》，《文博》2000年第3期。

[6] 严文明：《涧沟的头盖杯和剥头皮习俗》，《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

[7] 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8]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基址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7期。

[11] 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3页。

[12] 吴文祥、葛全胜：《夏朝前夕洪水发生的可能性及大禹治水真相》，《第四纪研究》第25卷第6期，2005年11月。

[13] 王青：《试论华夏与东夷集团文化交流及融台的地理背景》，《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

[14] 袁广阔：《关于孟庄龙山城址毁因的思考》，《考古》2000年第3期。

[1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28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赵青春：《新砦期的确认及其意义》，《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梁星彭、严志斌：《陶寺城址的发现及其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学术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通讯》第3期；叶茂林等：《民和喇家遗址发现地震和洪灾新证据》，《中国文物报》2002年3月15日1版。

[16] 俞伟超：《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衰变的奥秘一致“纪念发掘城子崖遗址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贺信》，《文物天地》1992年3期。

[17] 王巍：《自然环境变迁与史前文明演进》，《光明日报》2003年12月11日3版。

[18] 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19] 缪雅娟：《关于中国文明形成的思考》，《中原文物》2004年第1期。

[20] 王晖：《尧舜大洪水与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5月，第34卷第3期。

[21] 李伯谦：《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华夏考古》1995年第4期。

[2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7～168页。

[23] 张学海：《从考古发现谈鲁西南地区古史传说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